

唐代文學

論叢

總第六輯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學

論 叢

總第六輯

中國唐代文學學會

西北大學中文系

主辦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萧涤非

副主编：程千帆 胡国瑞 霍松林 安 旗

编辑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安 旗 刘善继 胡国瑞 高海夫
萧涤非 景生泽 程千帆 詹 锜 廖仲安
霍松林

唐 代 文 学 论 丛

总 第 六 辑

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编辑：唐 代 文 学 论 丛 编 辑 部

(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刷：国营五二三厂 发行：陕西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2,635

统一书号：10094·550 定价：1.75元

唐代文学论丛

一九八四年（总）第六辑 目 录

作家作品研究	1—19	论罗隐诗的讽刺艺术	王文龙
	20—31	试论李涉的诗歌	张虎升
	31	“越王宫殿”与“越王楼台”	雷树田
	32—55	李义山诗的心态	张伯伟
	55	也释“见说坡前客”	曹虹
	56—69	试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的继承与革新	海 鳌
	70—83	李德裕的诗和诗中的李德裕	田南池
诗篇赏析	84—99	李德裕的诗和诗中的李德裕	董乃斌
	84—99	陈子昂的骈文和散文	韩理洲
	100—108	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义探疑	张业敏
	109—116	《黄鹤楼》新探	葛培岭
	116	李白受屈	钟较弓
	117—122	边塞风光入画图	韩理洲
		——读李益《征人歌》·《早行》诗	
专题研究	122	唐人以时事入诗不始于杜甫	吴庚舜
	123—127	《酬凌符秀才惠枕》诗赏析	张浩逊
	128—135	读杜甫的《洗兵马》	刘长典
	136—159	唐代诗歌的流传（下）	范之麟
	160—165	漫谈敦煌变文的艺术特征	张锡厚
	166—171	唐人五言诗动词用法初谈	袁第锐

诗 话 随 笔	172—186	皎然《诗式》浅说	董丁诚
	187—195	读孟郊诗札记	鸿 棧
	196—199	《题杜子美坟》是伪诗吗?	周寅宾
考 证 笺 释	200—206	李商隐诗杂考续	王达津
	207—210	唐代诗文中的“寻常”	陈植钙
	211—220	小议韩愈《张中丞传后序》中的“旋”字	廖家鹏
	220	释“水晶帘”	方 乙
	221—222	《幽咽泉流水下难》考释	何世英
	223—227	《长干行》“绕床弄青梅”句解	陈 斌
	228—230	“眼花落井水底眠”试解	王穆之
	230	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句解	刘绍曾
	231—238	《唐才子传》笺证二则	雨 田
	238	“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	黄俊飞
	239—248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作地新探	晓 蕾
	249—266	李商隐《锦瑟》悼亡说新笺	孟祥荣
	267—275	“平羌三峡”辨	黄世中
	276—285	《唐代文学》论丛总目 (1981年—1983年)	凌 樵

论罗隐诗的讽刺艺术

王 文 龙

在百花争妍的唐代诗苑中，晚唐诗人罗隐的诗是带刺的玫瑰，是“荆棘满庭”的蔷薇。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他“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这话是颇中肯綮的。

罗隐“少英敏，善属文，诗笔尤俊”^①，然而他却碰上了一个倒霉的时代——李唐帝国的末世。他“十上不中第”^②，在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流离落魄，以至于衣食不给，饱尝了个中滋味。渐渐地，他学会了以冷眼观世，“闲看人间得意人”（《偶兴》），于是他看清了朝廷的政治腐败，看清了科场的漆黑一团，看清了世风的浇薄冷酷，更使他心里堆积着山一般高的怨愤。自然，他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难，看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力量（同所有的封建文人一样，对这一点，他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的），还看到了摇摇欲坠的唐政权在军阀混战中走向覆亡（尽管他并不情愿）……他所目击耳闻的一切，就是他的讽刺艺术之花生长的时代土壤。

罗诗现存四百八十多首，其中讽刺诗及其他带有讽刺性的篇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从题材来看，咏物、怀古、论史、咏怀、赠别、怀人、感事、登临，以至于题画、述理等，几乎应

有尽有。讽刺诗所涉及的题材范围之广，为有唐一代诗人所仅见。罗诗中虽然也有风情旖旎的作品，也不乏“棱棱有骨”（沈德潜语）的佳制，但总的说，比起这类讽刺之作来都是远为逊色的。我以为这同罗隐本人特殊的性格和美学情趣也是密切相关的。

这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诗人。据《唐才子传》载，罗隐“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这寥寥数语是颇能勾画出他的性格特点的。他本人以“傲睨公卿二十年”（《送宣武徐巡官》）自诩，初见吴楚钱镠时，竟然将“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夏口》逸句）这样借题发挥、嬉笑怒骂的诗句赫然标于句末，这都是他狷傲、自负、诙谐善谑的性格的表现（虽然他也曾以诗干谒公卿，但主要是为了功名，更为了用世，不是一味卑躬屈节仰求于人，这决不能成其为性格的主导方面）。惟其如此，他才能在讽刺诗中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就象地下水找到了喷发的泉眼一样。并且惟其如此，他的讽刺诗才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面貌。

罗隐的讽刺诗能一下子抓住读者，并赢得读者爱好的，首先是他的幽默感。一般说来，他对于所憎恶的事物，不是象杜甫那样或寓讽刺于叙写之中，或用春秋笔法加以褒贬，不是象白居易那样“周详明直”（冯班语），大声疾呼，也不是象李商隐那样吐属温婉，寄托遥深，而是以幽默的笔调，轻松、诙谐的诗句表达出来。使读者不期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甚而拍案叫绝。

看来罗隐连科不第，正因为他诗中的锋芒太触目了，“王

公大夫，多为所薄”^③，因而触怒了当权者。他的气挟风霜而富于幽默的诗篇尤其如此。《十国春秋》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

唐昭宗欲以甲科处隐，有大臣举隐《华清宫》诗云：
“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④。

可见诗中讽刺的火焰怎样灼伤了这些昏君佞臣。这正从反面显示了罗隐幽默的笔调所产生的艺术力量。

与《华清宫》相应成趣的是《帝幸蜀》^⑤：

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这首诗写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⑥。唐僖宗在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前夕，曾步唐玄宗的后尘，仓惶出逃，在第二年正月到了成都，直到四年以后才又回到长安。诗人从“马嵬”落笔，用一个“又”字，便把两次相似的历史事件拴在一起，嘲讽的意味已见于言外了。

我们读罗隐的讽刺诗，常常使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其中幽默笔调的艺术闪光，是那些诗句爆发出来的讽刺的火花。如“只道鬼神能护物，不成龙象自成灰”（《甘露寺火后》），对连“龙象”都不能保全的“鬼神”的嘲笑；“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炀帝陵》），对隋炀帝荒湎失国的揶揄；“何必更寻无主骨，也知曾有弄权人”（《北邙山》），对弄权人的戏谑和警告；“吾今尚自披蓑笠，你等何须读典

坟”（《代文宣王答》），对重释道、轻儒学的风尚的指责和愤慨；“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偶题》），在奚落对方的同时兼述身世沉沦之感；“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柳》），借对彷徨无计、自顾不暇的柳条的讪笑衬托离人的惜别之情；等等，无不妙语解颐，耐人寻味。

难能可贵的是，罗隐讽刺诗中的幽默往往是用比较深刻的思想（在幽默的背后，是诗人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抗争精神）和卓尔不群的才智熔铸成的，它寓庄于谐，妙趣横生，同肤浅、油滑是没有共同之处的。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就艺术表现来说，大抵在藏与露之间，或者说是半藏半露，在嬉笑中见针刺，在平易中见奇妙，在浅显（那都是高度口语化的）中见深隽。所以富于幽默感，实在是罗隐讽刺诗的一大特色。如果我们把罗隐誉为诗家中一代幽默大师，也许并不过分。

幽默当然不是罗诗讽刺艺术的全部。在种种黑暗而丑恶的社会现象（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和社会势力面前，罗隐有时按捺不住自己的满腔怒火，手中讽刺的诗笔便脱颖而出，投向他所深恶痛绝的一切。如《塞外》、《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关亭春望》、《后土庙》、《王夷甫》等，都饱和着诗人的憎恶之情，写得锋芒毕露，从人间统治者到“枯木似人形”的“神物”，从历史上外表道貌岸然实则败坏世风的清谈家到现实中祸国殃民、骄奢愚蠢的藩镇，都无可逃遁地显出了原形。

这种直接讽刺的方式在诗中广泛地采用，是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突破。它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斩钉截铁式或剑拔弩张式的刚劲的美。《塞外》、《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两

首，都是讽刺与揭露双管齐下，刻骨露相，富有表现力。《关亭春望》中“信、越功名高似狗”，《塞外》中“塞外偷儿塞内兵”等诗句，更是憎恶之情的迸发，是“热骂”，尤使人感到痛快淋漓。据《十国春秋》记载：“隐与顾云谒淮南高骈，隐见骈酷好仙术，潜题后主庙刺之，连夕挂帆而返。巫者告骈，骈怒，发急棹追之，不及。”这种直接讽刺的方式有着多强的力量，由此也可可见一斑了。

直刺方式的运用，离不开诗中议论，弄得不好，势必游离于诗的形象之外，变成声色俱厉而又空洞的呼喊。罗诗一般没有这种弊病。他是以议论（直刺）为骨架，以形象为血肉，把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淮南高骈所造迎仙楼》：

鸾音鹤信杳难回，凤驾龙车早晚来。仙境是谁知处所，人间空自起楼台。云侵朱槛应难到，虫网闲窗永不开。仔细思量成底事，露凝风摆作尘埃。

一、二句借助于想象中的形象说神仙之事渺无音信，微露讽意；三、四句是议论，进一步说仙凡相隔，建造楼台枉费心机，针刺一下子突出来；五、六句实写空楼荒凉景象，恰好与前两句虚写相契合；七、八句总括全诗，“仔细思量成底事”，直斥高骈，是全诗的“眼”，而第八句仍以景结，既补足了五、六句，又藏虚于实，把议论的锋芒包蕴在形象之中。

当罗隐把目光向最高统治者、向整个社会（即唐帝国）投射开去，心头激起更强烈更深沉的愤慨时，他就又换了一副笔墨。请看《曲江春感》中这两句：

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

从题目和全诗的意思来看，《曲江春感》大致可断为唐懿宗咸通年间作者困居长安时的作品。他累试不中，滞留京城，到了“寒饿相接，殆不似寻常人”^①的地步，实际上成了这个时代的“弃儿”。所以这两句看起来似乎是自宽自解，其实是牢骚话，是冷峻语，其中蕴蓄着作者极大的愤懑和不平。它的真正意思倒是“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奈贫儒得路难”（《江边有寄》），“未知栖托处，空羨圣明朝”（《秋寄张坤》）。不过它没有直说，不是象孟浩然当年说得那样直率和芒刺径露：“不才明主弃”，结果招致玄宗的“不悦”，碰了个钉子（当然罗隐前面大半生的命运绝不比孟浩然更好一些）^②，而是用了反语，但讽刺意味反而要强烈得多。这就是“冷嘲”。

在罗隐的讽刺诗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比“热讽”更为尖锐的“冷嘲”的诗句。但竭尽冷嘲之能事的诗作还要数《感弄猴人赐朱绂》：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全唐诗》在诗题下有注云：“《幕府燕闲录》云：‘唐昭宗播迁，随驾伎艺人止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这件出自朝廷的奇闻就是诗人写作此诗的背景了。诗中前两句概括了自己多年科场失意、进退维谷的境遇，后两句突然换了一种口吻：我怎么学得上那个“孙供奉”，买只猴子戏耍一番，便博得君王的欢心，立刻取得高官

呢？这两句表面上是企羡，骨子里是激愤。诗人明明鄙薄“孙供奉”那样的小丑，偏偏用了“学取”这样的字眼，更能传出他内心那种“白热化”的愤恨之情：天下事是何等不平，朝廷对人才是何等轻视，那个“君王”又是何等昏聩啊！因为这两句是从诗人那充满着屈辱和痛苦的心灵中发出来的，是冲者凛然不可侵犯的皇帝说的，嬉笑怒骂，兼而有之，所以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幽默、直刺、冷嘲（有时带有幽默的成分），是罗隐常用的三种讽刺方式，这就使他的讽刺诗显示出独标一格的基本方面：明快，犀利，富于幽默感，并以富于幽默感为其基调。

二

历史上任何有成就的诗人，都割不断他同传统的血缘关系。罗隐的讽刺艺术同样得到了《诗经》、《楚辞》以来的艺术传统的滋养，因而使得他的讽刺诗呈现出更加多彩多姿的风格面貌。

我们这里着重论述的是比兴手法的运用。罗隐在他的整个诗歌中大量运用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段。同他的《谗书》中的小品文一样，他的一部分讽刺诗常常自出新义，借助于比兴手法，别出心裁地加以表现，既写得形象鲜明，新奇可诵，又闪耀着讽刺的光焰。

如果我们不拘守于古人对比、兴字面上的解释，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所谓比兴，实际上就是比喻、比拟、寄托、象征这些手法。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附托外物”（郑众语），“婉而成章”（刘勰语）。至于“讽兼比兴”，刘勰认为是从屈原的《离骚》开始的^①，其实《诗经》中的《硕鼠》等篇已开先

例。

写历史题材的怀古诗和论史诗，是罗隐“讽兼比兴”的诗篇中的一部分。这虽然不是罗隐的独创，但他的这类诗一般写得新颖可喜，时露卓识，而又笔锋犀利。如《西施》：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
越国亡来又是谁？

很明显，这是一篇翻案文字，诗人对用庸俗的历史眼光去看待家国兴亡，把亡国的原因统统归之于“女祸”的人作了讽刺。末句以铁一般的史实发出诘问，发人深省，字字千钧。这是一首论史诗，它鲜明地表现了诗人对家国兴亡的卓越的历史见解。然而它的妙处还在于有寄托。诗人这时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唐王朝大厦将倾的种种迹象，因而借评价西施对玄宗朝杨贵妃的故事隐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与《帝幸蜀》一诗的作意是相通的），进而对现实中的“吴人”加以挖苦，向最高统治者发出有力的警告：这才是诗人的本意。

此外，如《秦纪》、《贵游》、《炀帝陵》、《江南》、《江北》等也运用了“讽兼比兴”的写法，而又各有其艺术面貌。这些诗其实都是政治讽刺诗，是通过历史题材抒发对现实政治的感触的。诗人以比较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历史和现实某些相似之处，而后以寄托入诗，从咏史着笔，或假诸形象，或旁敲侧击，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这就是这些诗在立意和构思方面的共同特色。

罗隐写过为数不少的咏物诗，而且颇多佳构，其中“讽兼比兴”的篇章尤为引人注目。从生物界的柳、仙掌、残花、

蝶、鹭鹭、病马等，到自然界的黄河，以至于春风、浮云等自然现象，都成了供他讽咏的诗料。其中《病骢马》、《残花》两首都是自伤生平的，只是在结尾处露出讽意，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着悲剧命运的诗人自己的影子。《鹭鹭》一诗却与众不同。诗人在描摹了鹭鹭生活的具体环境之后，居然以幽默的口吻向它告诫说：

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

意思是说：鹭鹭啊，尽管你是一身“素白”的，可是你不应当向人夸耀说你的心灵也是素白的，因为你常常羡慕那水中的鱼，总想得到它，美美地吃上它呢！这两句妙语双关，话中有刺。纵观罗隐的生活遭遇、思想历程以及全部诗作，我们就会了解到这首诗原来是诗人自嘲。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立志功名而功名不就，另一方面想退隐江湖而又不甘沉沦。“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西京崇德里居》），正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他还不止一次地在诗中表达了他对“蟾中折桂”的向往和热衷。当他那种“徒有羡鱼情”的隐衷一旦从“鹭鹭”这个物象中找到了寄托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发而为诗，写出了自我嘲弄的诗句。

罗隐的“讽兼比兴”的咏物诗更多的属于政治讽刺诗（上述隐以自况而兼有讽意的咏物诗似不在此例），它们是借助于咏物这一特殊的形式来讽喻和批判现实政治的。诗人“呼吸而领会之”的现实政治空气的恶浊，激起了他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他从以白眼看世间事、世间人，进而以白眼观世间物，于

是这些事物顿时都失去了本来的色彩，而成为人们似曾相识的某种人或某种社会现象出现在诗人的笔下，诗人则以此一浇胸中的块垒。这固然是时代使然，是诗人的思想性格使然，而与移情在创作中所起的奇妙作用也是分不开的。

从古以来，多少诗人写过黄河，歌颂过黄河奔腾浩瀚的气势，只是到了罗隐，黄河才一下子变成了他诗中讽刺和鞭挞的对象：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故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诗一开头，我们就感到诗人有一股怨愤喷涌而出，原来他把黄河同那个使他“啮破愁肠恨一生”（《出试后投所知》）的科场联系了起来，用“天意”“难明”喻指科举制度的虚伪性。正因为科场象黄河一样混浊，纵然使上“阿胶”（一种可以澄清浊水的药剂）也是无济于事的。接着，诗人又把“黄河”比成士子，把“银汉”比成朝廷，把“昆仑”比成王公大臣，说是士子要打通通向朝廷的关节，那就非使出卑劣的手段（“曲”）不可，那些因王公大臣的荐引而登科的士子们，一踏上仕途就不干净了。这就等于捅开了晚唐科举制度的黑幕。在追本穷源（这是罗隐的认识）之后，诗人便化用了两个与黄河有关的典故，进而对上层贵族集团（“仙人”）大加嘲骂：他们世代簪缨，仿佛真要等到黄河变得象衣带一样狭小才肯罢休；他们把持朝政，使那些有所求的士子（“客槎”）一经援引，便轻而易举，平步青云。尾联回应首联，诗人对“黄河清”的说法发

抒感慨，表现他对令人不堪忍受的现实一腔愤激之情。总之，全诗看起来好象每句都是写黄河，其实都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和上层贵族集团加以抨击的。这是典型的借题发挥。

《钱》是一首很特别的咏物诗。诗人把“志士”和“小人”对金钱的不同态度作了对比，并写了金钱“解释愁肠结，能分睡眠开”的妙用，结尾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躲在金钱后面的豪强贵族拎了出来：

朱门狼虎性，一半逐君回。

“朱门”横行霸道，竟有一半靠的是为虎作伥的金钱，这就更有力地揭露了世风的险恶，揭露了豪强贵族贪财逐利的虎狼本性。

诗人托物寄讽、借题发挥的本领是很高明的。在他的笔下，天空中的浮云成了拚命向上爬的仕途小丑（《浮云》）；大地上的春风成了善恶不分、玉石不辨，任意抬举庸才、蠢才的贵族官僚（《春风》）；小小的萤火虫竟然忘了自己卑微的根底，打算倚仗可怜的“孤光”乘机炫耀一下，这不酷肖那些无才无德夤缘得进的新贵么（《萤》）？轻盈的蝴蝶急切地跳起了美妙的舞蹈，只恨自己身子太轻，飞不到高处去，这与那些投机钻营而未能得逞的世俗小人又何其相似（《蝶》）！……

以上这些诗，作者都综合地运用了比喻、拟人、象征的手法，抓住物象某一方面的特征，加以适当的夸饰，从前人所未有写过的新的角度去进行描写，而在刻划某一个物象的同时，总是注进自己的新意，安上这样那样的“针刺”（寄托），从而塑造了荒唐可笑的丑角似的形象，给读者以很高的美感享

受。于是这些咏物诗在艺术上放出了奇光异彩。如果说罗隐以怀古、论史为题材的政治讽刺诗比之史笔、诗才尤擅的李商隐的同类作品来还瞠乎其后的话，那么他的以咏物为题材的政治讽刺诗就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除了比兴之外，罗隐的讽刺诗还运用了另外一种传统的手法：对比。这同白居易的讽谕诗所使用的手法尤为相似，虽然它在罗诗中还没有象在白诗中那样形成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

比如，《秦中富人》描写了富人奢华、舒适的生活和挥金如土、意犹未足的心理，篇末则以寒士作对比：“陋巷满蓬蒿，谁知有颜子！”写出了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病骢马》描写一匹衰病伏枥而雄心犹壮的骢马（这首诗别有寄托，已见于上文），篇末则指出：“龙媒落地天池远，何事牵牛在碧霄？”发出了一种不平之鸣。这多使我们想起白居易的《轻肥》、《歌舞》等激动人心的诗章！

诚然，罗隐没有给我们留下象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概括力极强、动人心魄的名句，他的一些讽刺诗在对比的深刻性和感染力强方面也不能同白居易的讽谕诗相比。不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罗诗还是有其不可抹煞的长处的。

我们知道，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运用了“曲终奏雅”的传统方式，动辄来一个“卒章显其志”^⑩，虽然对比强烈，写法却未免雷同。罗诗并没有一律采取这种写法，而是有所变化，有所创新的。例如，《汴河》诗劈头两句就如双峰对峙，形成对比：“当时天子是闲游，今日行人特地愁。”从时间、人物及其心情等方面来加以对比。再如组诗《谒文宣王庙》和《代文宣王答》，作者更是匠心独运，横跨两章诗加